

商都钟鼓

善哉狠话

高玉成

前不久,中纪委十八届四次全会上,王岐山放狠话了!

有人把王岐山的狠话概括为十句,其中包括:怒斥一些党员干部“无视规矩,不讲廉耻,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当回事,毫无戒惧之心”,“在此高压态势下……不敢手,甚至变本加厉;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方式腐败,令人触目惊心!”必须“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,严的措施管住干部”,表示“党中央横下一条心,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”,警告“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取我行我素,依然故我,就要为我们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!”“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,一旦出现反复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等等。

王岐山的话,是激愤之言,是下定决心之言,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是一次教育和触动,对于少数腐败分子是一次警告和震慑!

的确,很长一个时期以来,贪腐问题在我们“聚精会神搞建设,一心一意谋发展”的同时,也在悄悄滋长、蔓延。虽然各级也不断地讲、不断地抓,但反腐这一手显然比经济建设那一手来得松、来得软。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尽管是少数,但已经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破坏;民愤之大,无过于此了!习近平最近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

总结大会上意味深长地说:“如果我们党弱了,散了,垮了,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?”仿佛是说,GDP再高,党垮了,GDP留给谁?房子修得再豪华,主人不在了,房子给谁住?

2012年12月,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不久,就立下“八项规定”,祭起了改进作风的大旗。刚开始,大家还觉得中央规定离自己比较远,有等待、观望的思想。很快,各地开始抓吃喝、抓送礼、抓公车私用,大家又揣测这会不会又是“一阵风”、“一溜烟”。直到违反“八项规定”的通报雪片般飞来,撤职、免职、处分的消息不绝于耳,且越抓越紧,势头越来越猛的时候,大家才发现这次整治是下决心、动真格了,才发现这次不只是“打雷”,而且是“下雨”,不只是雨过地皮湿,而且是下深下透,涤荡每一个角落和空间。另一方面,惩治腐败分子也像挖萝卜一样,大大小小,长长短短,一个个连根带泥拔出来,力度之大,查处之密集,前所未有。有人统计,十八大以来两年间,仅查处省部级以上高官就多达56人,超过之前数十年的总和;至于“苍蝇”、“苍蝇”之流的,更是几乎天天有,甚至一天多个,难以计数。一时间,那些手脚不净、心中有鬼的人变得惶惶不可终日。今天还上班,明天就不知去哪;刚才还开会,会后就不知

被谁带走,甚至有些人得“抑郁症”了,或者干脆自杀身亡了。

所以,王岐山的话之所以狠,是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,是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,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切忧患,下狠手,出重拳,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结果。这样的狠话,越多越好,越狠越好!
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有言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说自己早晨喝木兰花上的露水,晚上吃秋菊的花瓣,以示自己清廉高洁。其实,对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,都是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。但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并非易事,似乎不随波逐流就是不识时务,不见风使舵就是不与俱进——这就是风气之害。现在,党中央“横下一条心”整风肃纪、惩治腐败,给我们改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态势和环境,每个党员干部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言行,下定决心改造旧习惯,适应“新常态”,并把“新常态”变成常态,变成风吹不进、雷打不动的定力,最终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。诚如是,则是党之幸,国之幸,民之幸,每一个党员干部之幸!

散文

枕泊两条船

王太生

把枕头当作码头,泊着两条船,一条是明朝张岱的夜行船,一条是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。船是适合中年人。在夜晚作精神远游的。所以,在我的枕边,放着两本书,泊着两条船。

年轻人心头怀揣两只小鹿,安静不下来,欲到达某个目的地,往往乘飞机,或坐高铁,在古代选择骑马,过程省略掉了。

中年人则不然。中年人从淡定,喜欢慢条斯理地坐在船上,一边看山,一边看水,在看的过程中领略人生快意。

明朝张岱的船,是从杭州出发的,质地朴实,线条流畅,在江南的山山水水间穿行;清代李斗的画舫,围雕雕刻,精巧雅致,在瘦西湖上,像鸭子一样游弋。想都是两个中年人,在昏黄的灯光下,铺展濡染,一个人的黑白山水。

走过那么多的山,行过那么多的水,看过那么多的人,于是,不急,在纸上行船,一笔一画地撑篙划桨。

夜行船,在中国南方,相当长的时间里,是主要交通工具,古人在一种缓慢的节奏中,晓坐夜宿,日夜兼程,在某个天光熹微的早晨抵达。

春天的夜行船,有南方最美丽的景致。鲁迅《社戏》中描述,“河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,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”,月色朦胧的河面上,使人心旷神怡。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地。张岱的船,在青山如黛,水墨画般的江南山水里穿行;李斗的画舫,剪开细雨霏霏中,一帘依依垂柳。

我与两条船,中国古典写意氛围中相遇。6岁那年,坐船到苏北某个水乡小镇。船从小城出发,在纵横如毛细血管的河流上航行。漆黑的夜晚,岸上影影绰绰,偶尔看到远处房子里朦胧的亮光,在幽静的旷野,一灯如豆。

人生很多时候,清风盈窗,并没有什么人在给你讲故事,只有一船人,枕着水波,赶路酣睡。倘若此时,有人依窗阅读《夜行船》就好了。微弱的灯光,曾经照亮漆黑的旷野。那时候,我坐在船上,欣喜于一条船从远处迎面驶来,两条船挟着清冽水汽,擦肩而过,看那条船上的人,朝这条船张望。两条船像萍水相逢的鱼,只甩甩尾,又各自分开,游向夜的深处。

扬州是我熟悉的城市,李斗提到的那些陈迹,遥远而亲切。那时我想,李斗是仪征人,怎么会对扬州语焉甚详。这位清代戏曲作家,原来是广陵客,就像现在在一个县城里的人,买房或租房,住在中心城市。

笔下喜好,这大概是文人特有的权利。由着自己的性情,一路信手涂鸦,他提到扬州城里的园林名胜、戏曲、风情、名人轶事,那个地方的风景、美食,终究难忘。

夜行船在天光云影中航行。我在18岁那年,终于有一次机会,邂逅张岱的船。

在无錫坐船到杭州,真是无巧不成书,遇到了张岱笔下提到的僧人,那两个人是在杭州灵隐寺出家,回乡探亲,静静坐在返程的船上,很少说话。这样一种情境,至今想来,它让我很好地体味张岱航行的意境。夜行船也许是熙攘嘈杂的,但熙攘嘈杂中,万众缄默时,有大安静。这时候,有人在做着美梦,有人在想着自己的心事,只听得见船板底下,一片汩汩的湍急水声。

夜晚的太湖,渔火点点。拂晓时,船入京杭运河,我终于从某处码头,登上这一片柔软的江南繁华地。

《夜行船》是闲聊、讲故事,《扬州画舫录》也是闲聊、讲故事。不同的是,这两个人,一个在明朝,一个在清朝,时空交错,已隔隔世。

夜行船有悠远的意境,它接纳外出打工谋生的民工,衣锦还乡的白领,带来一串故事,又带走一串故事,消逝了夜行船的水面,又很快恢复平静。画舫优雅地在瘦西湖和古运河游弋,适宜下午茶,或品茗,或沿岸观景,属于闲适的小资消费。只不过,夜行船适合远行,画舫只宜近游。

中年有中年人的闲情,他坐在船上写岸上的事情,却把讲故事的情境安排在船上,四周一片天光云影。水上一块狭小的世界是移动的,适宜讲故事,窗外穿插不同的插图、背景。于是,色彩不同,心境也不同。听客上岸,各奔东西,于是,那些故事像长了脚,从船上跑到岸上的杳杳杳,那些人也杳杳杳。

在中国古代,船是一个载体,一个信息集散地。张岱的船,李斗的船,船来船往,人聚人散,旧事如烟。

· 郑古塔

法玩塔

王学宾

少林寺塔林,保存有自唐以来230多座古塔。塔林安葬的,是少林寺及其他寺院的历代高僧大德。这些高僧大德,如繁星一般,照耀着少林寺发展的道路。

也许是巨星太多,而又过于密集,以至于他们的个体光芒被群体星光所掩盖了。所以,人们到少林寺塔林里参谒的时候,基本已经不太关注这些“巨星”了。其实,如果真正去认真了解的话,每座塔都可能引出令人感叹的故事……在少林寺塔林里,法玩塔是最为重要的一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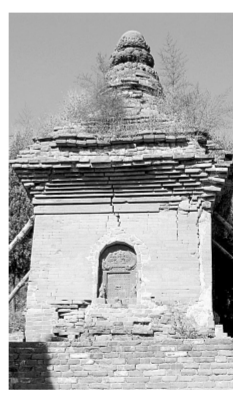
法玩塔是塔林里最古老的塔。此塔建于791年,是塔林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座塔,也就是说,在此塔之前,此地还没有任何一座塔,从这方面说,可以说法玩塔是整座塔林的开创者和奠基者。

法玩塔是整座塔林的核心。塔林里的塔,以法玩塔为中心基点,呈扇形分布,由此可以显示出此塔的尊崇地位。

法玩塔的石雕在塔林中最为精美。法玩塔为方形单层单檐式砖塔,通体用磨砖砌造,而塔门、塔刹和塔檐都用青石雕成,塔门装饰

着飞天、娼伽等佛教纹饰,精美华丽。塔刹自上而下有五层石组成,分别为飞天、转轮座、莲花座、台形石和球形宝珠,雕刻精湛,表现出唐代石雕艺术的高超成就。

塔后有塔铭,介绍了法玩的生平。法玩(714—790年)俗姓张,18岁礼大照普寂为师。法玩是一位律、禅皆通的禅师。塔铭说他:“以戒律摄妄行,以禅寂灭诸相,以辩惠通无碍。”法玩常往来于少林寺和洛阳敬爱寺之间,法玩死后,为他送葬的队伍有上万人。为法玩撰写塔铭的是李充,时任太中大夫,守京兆尹,是首都长安的最高长官,他的母亲跟着法玩出家为尼,法名寂然。李充评价法玩“教被唐洛,德高嵩少”,由此可以看出法玩的影响力。



法玩塔

· 博古斋

竹木简古写本

尔东

《仪礼》(竹简本)是我国最早比较完整的竹木简古写本。

“仪礼”计有“今颁酒”、“丧服”等七篇,其中“丧服”共有三个不同的抄本。1959年在武威汉墓中发现了504根竹木简。其中有469根,据初步考订,是西汉末年抄写的《仪礼》。据初步研究证明,这个新发现的木简,是未被郑玄改动的前汉后期古本,也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书写本。这个本子的发现,不仅为研究《仪礼》提供了珍贵资料,而且还证明了汉代文化远及于今日河西等地。尤其可贵的是这几篇书的简长二尺四寸(汉尺),每简编有号次,编绳虽已烂掉而痕迹还很显著,使得差不多两千年后的我们还能见到古简策的本来面貌。



秋水无际 (国画) 董继宁

· 新书架

《汉口的沧桑》

余向丽

这是一本有关汉口旧事的书。

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,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。汉口有许多老故事,故事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。在漫漫的时光中,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。这些零星散落的老建筑,就像汉口这篇文章中的关键词。扣住了它们,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,仿佛听到了汉口久远的呼吸和脉动,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样走到了今天。

书中纪录片呈现“汉口的沧桑”,行文走笔常怀忧愤;为后人常忘前人之开拓而“怅然若失”;为南洋公司和新市场“相互竞争,抢夺地盘”的内斗而悲伤;为民众乐园“60年间,八易其名”,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“哀民生之多艰”;为南洋兄弟公司这样“早期的民族工业”在外资的倾压下艰难发展,在形形色色强势政权巧取豪夺下“成为短命公司”忧愤不已;为“铁蹄下的民众”而哀伤;为偌大一个城市连一个像样的花园也找不到而遗憾……凡此种种,多少往事俱成愁。方方以人命运为经,以汉口变迁历史事件为纬,以与汉口历史有关的突出意象为精神内核结构篇目,为历史古城汉口描绘出一幅独具精神气质的人文画卷。

· 博古斋

古书的流传

陈永坤

式雕印经传的出现,但历代“正史”,到宋代才陆续付刊。公元994年(宋太宗淳化五年),开始以《史记》、《前汉书》付雕;公元1000年(宋真宗咸平三年),刊印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唐书》;公元1024年(宋仁宗天圣二年),刊印《南北史》、《隋书》;公元1061年(宋仁宗嘉祐六年),刊印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,于是诸史略备。这是我国后世讲版本学的所谓“官本”。这期间毕昇于公元1041年到1048年间(宋仁宗庆历年间),始创泥活字版,使书籍的印刷更为方便。

宋代刊书,除“官本”外,以坊刻本为最多。当时“天下印书,以杭州为上,蜀本次之,福建最下”。后人讲究“版本”学,迄今“版本”为藏书家

所注目之珍宝。

宋代刊书,一、浙本。浙江的杭州,为宋代雕刻印书的核心。经国子监校勘的书,多数在这里雕印,称为“浙本”,为宋代中最佳者。二、蜀本。为宋代在四川刻印的书。其字体最大,又称“蜀大字本”。三、闽本。宋代福建以建阳、麻沙刻书最多。当时当地人以榕树木质刻板。榕树质软,雕刻快速,但质量不佳,在宋版中为最劣。

传世的刻本书,以宋版为最早而珍贵,但因年代久远,所存已经不多,其次而以“元刊”为最可贵(元刻本源出于宋,而胜于宋刻者)。因此藏书家们讲究版本,经常以“宋元”并称。

连载

押宝蒋介石

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

谢国平著



比孙传芳更有实力的强人用刺刀为他撑腰。

另外,虞洽卿和所有商人一样,都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:群雄逐鹿,粮草是要紧的,所有的商人都在向商人要钱,那钱给谁?有多少回报?

明朝江南首富沈万山的下场,江浙财团的大亨们不是不知

道,他的豪宅就在离上海城不远的周庄镇上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要筹募资金筑筑城,沈万山十分爽快地拿出巨款修筑都城,并亲自坐镇督工监造。这本是一件讨好朱元璋的好事,但是沈万山热情过了头,又去搞劳朱元璋的军队。疑心特重的朱元璋顿起杀机,一个商人竟然打我兵马的主意!幸亏马皇后劝谏求情,朱元璋才改为把沈万山流放云南,直至客死边疆。

上海的商人绝对不愿意重蹈沈万山的下场。

虞洽卿此番来南昌就是想知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态度,是左派还是右派?还不认宁波同乡和江浙财团?此前自己的女婿已去过广州,蒋介石曾表示不会忘记上海的朋友。但是,此公一再公开表白自己将与共产党人合作到底,并曾以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”团长的身份赴苏俄考察。

所以,他要亲自上门探探虚实。他毕竟跟蒋介石还有着一段非同一般的情。

当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后,蒋介石就离开上海前往山东,参加中华革命军东北军,任参谋长,但由于锋芒太露,得罪了不少人,一气之下,蒋脱下军装,来到上海租界。

一天,蒋介石百无聊赖中听陈果夫说他认识上海滩的大人物虞洽卿。蒋介石眼睛一亮:这不正是他巴望见的人吗?陈果夫没有言言,蒋介石顺利地见到了虞洽卿。这一见面也就演绎出了后来江浙财团与南京政府的故事。

虞洽卿曾答应帮孙中山筹办一家交易所,为革命集资,蒋介石的脑筋也就跟着转到了炒股,票上。起初,蒋介石炒发了大财,“不半载,迭获巨利,母子相加,竟达数十万元,俨然富商矣。”但后来又全输光,还欠下一屁股债,只好找到虞洽卿求助。虞洽卿建议蒋介石去投帖拜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为“老头子”,只要老头子替他说一句

话,谁还敢来讨债?黄金荣的门徒黄振声,上海渔业领袖、中国渔业银行董事

委员会委员,为某人身安全计,蒋介石又特别规定,在上海未光复以前,钱的名字不得在报上发表。

3月,蒋介石到上海后,任命钱新之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。

4月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钱新之任财政部次长。当时部长古应芬尚在广东,钱新之便全权负责部务,一个银行经理一夜之间变成了部长级政府官员。

钱在任内尽心尽责为蒋介石筹措军政费用,为蒋介石政权立下不小的功劳,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。

至于陈光甫,南京国民政府还未成立,就被任命为江苏财政委员会副主任。蒋介石又给了他一串的头衔,虽然陈光甫一一拒绝,但蒋介石依然视陈为座上客,陈光甫也因此而受惠良多。

钱新之、陈光甫出手援助蒋介石后,江浙财团另一位核心人物虞洽卿也坐不住了。他动作更大,索性沿江而上,要去南昌见蒋介石,摸清蒋介石的底牌。

据后来担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回忆,北伐军到了北京之后,有一天,他上北京饭店看望亲戚戚徐梓,一走进徐梓的房间,就看到钱新之也在座。徐梓也不回避夏晋熊,对钱新之诚恳地表示感谢:“老兄和光甫的50万,数额虽不算太大,但解决了总司令的年关急需,所以总司令很满意,一直把这一次借款记在心里,几次说起要报答两位。”

蒋介石也庆幸自己看准了人。钱、陈二人年轻有为,在上海金融界已成为领袖人物。钱是“北四行”的领头人之一,也是浙江湖州人之一,陈果夫了解他,又是日本留学生,在日本有不少朋友;陈则是“南三行”的领头人之一,留美学生,与孔祥熙熟识,可利用他接近美国,争取美国人的支持。

此后,蒋介石政府向钱新之、陈光甫敞开了大门,仕途一路畅通,高风险的投资有了高回报。

1927年2月,北伐军光复杭州,钱新之被内定为浙江省财务

分别以后,师徒二人互不通信,一晃就是6年过去。